伟大与平凡的辩证法

——近年长征题材长篇小说一瞥

刘小波
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围绕这一节点，多部长征题材小说新作问世，包括欧阳黔森《起来》、陶纯《幸存者》、安昌河《遥远的红啊》、彭学明《爹》（增订版）、王刚《凤凰图》、鲍尔吉·原野《雪山杜鹃》等。这些作品呈现出一种共通的审美趋向与叙事自觉：它们并未将“伟大”视为先于叙事存在的既定结论，而是将其作为需要依托具体生命经验逐步“生成”的动态过程进行书写。这一转变的本质，并非宏大叙事的消解，而是叙事伦理的内在调整，长征作为人类奇迹的宏大维度并未被回避，但其呈现方式进一步聚焦历史洪流中普通个体的觉醒、挣扎、奋斗与牺牲。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：当普通人的故事被置于叙事核心，文学实现了何种表达增益，又可能存在何种局限。

呈现普通个体情感经验

经典的长征叙事美学范式，以魏巍《地球的红飘带》为代表。这部长篇小说自湘江战役起笔，贯穿遵义会议、四渡赤水、强渡大渡河、胜利会师等关键历史节点，以全景式结构覆盖中央红军长征历程，兼具宏大规模与磅礴气象。其叙事重心在于历史进程的总体走向与红军领袖的战略决策，读者在接触文本前已对长征历史形成认知，叙事的核心任务在于验证与再现这一伟大。更早阶段，陈其通《万水千山》以及王愿坚《七根火柴》《三人行》等作品，奠定了这一传统的情感表达框架，牺牲、忠诚、信念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意义闭环。这一叙事传统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，但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：比如，在“伟大”的总体性宣告之下，如何呈现普通个体复杂的情感经验？

新近问世的这批作品，恰恰在这一维度上进行了突破。欧阳黔森《起来》选取小切口，展现黔东山区农家妇女冷小朵面对儿子当兵时的复杂心理。大儿子被抓壮丁当了白军，二儿子和三儿子则选择追随红军。小说着重叙述底层百姓在离散与聚合、被动与主动、国家大义与亲情伦理之间的摇摆。冷小朵从不让孩子们当兵，到“谁能为我们死，我们就能为谁而死”的思想觉醒，并非瞬时顿悟，而是形成于从“囿于灶台”到“走出家门”的漫长过程，其间交织着母性的现实考量、生存的恐惧与偶然的际遇。小说将“信仰”转化为动态的实践过程：信仰是在血泪淬炼中逐步生成的，而非被预先植入的价值观念。这种叙事方式将“伟大”复归至时间维度与身体经验——一位母亲的恐惧与勇气，首先是身体性的、具体的生命体验，而后才升华为政治层面的信念表达。

陶纯《幸存者》将这一叙事逻辑延伸至更为极端的情境中。小说中，7岁的彭天佑因缘际会成为小红军，在历次遭遇战中，唐本奇、毛小虎、王大妮等人为保护他相继牺牲。小说的叙事伦理并非指向天佑最终成长为“优秀红军将领”的结局，而在于对牺牲的叙述方式：这些牺牲不仅是英雄主义的壮举，更是一种近乎惨烈的“生命庇护”，成年人以生命为一名孩童争取出生存空间。此处的“伟大”不仅源自英雄人物的品格投射，也从脆弱的、依附性的、需要被保护的生命中反向生成。7岁孩童的懵懂认知、恐惧情绪与依恋心理，成为衡量牺牲价值的精准标尺。

王刚《凤凰图》则在“离散”的空间维度中展开同一叙事伦理的实践。一支红军小分队为掩护主力转移而与大部队失去联络，18名战士在乌蒙高原的崇山峻岭间踏上另一段生死未卜的征程，悲壮牺牲。作者在后记中提及，其核心关注对象为“那些溢出河流的水滴”。这一意象，精准界定了普通人在长征叙事中的定位：他们恰恰构成历史的基座。这部小说采用双线叙事结构，一方面以连长许邵武的手稿还原18人的行军历程，另一方面以当代寻访者视角重走革命之路，实现历史与当下的互文，再次确证长征的意义并非陈列于纪念馆的结论，而是在代际重访过程中持续生成的开放性阐释。

彭学明《爹》（增订版）则提供了另一种叙事路径：其书写焦点并非前线的军事斗争，而是后方的社会承载。增订内容围绕长征背景，补充了中央红军“通道转兵”的侧翼叙事与红军转战邵阳的历史进程，瞄准未直接参与战斗、却在离散与等待中承受历史的普通民众。彭学明提及，“他们理应被看见”。“被看见”这一表述本身即指向叙事伦理的转向：文学的功能是发掘既有叙事框架中有待被发现的新个体，并赋予其生存境遇以伦理价值。安昌河《遥远的红啊》同样以“微观切口”进入，书写红军与川军展开激战的历史，其创作方法同样是以平凡人物的微观视角，诠释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。

构建共通的叙事伦理立场

当“微观切口”不再限于个案而成为作家的普遍创作选择时，其意义便超越了单纯的叙事技巧偏好，升华为一种共通的叙事伦理立场。也因此，历史的可阐释性在于叙述者将读者带入当时的环境中，通过置身其中而获取。不过，这类作品也面临不小的挑战，那就是有可能陷入另一重简化倾向，比如将普通人形象浪漫化、将苦难体验审美化，抑或将“生成性叙事”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。

《雪山杜鹃》和《幸存者》较好地规避了这一问题。作家让细节停留在生存的粗砺层面，而非充当升华主题的辅料，让“幸存”成为伦理负重的位置，而非成长的终点。《幸存者》中那些为保护主人公而牺牲的个体，均在其生命中留下了空缺，而天佑的“幸存”始终承载着这些空缺的伦理重量。当面向青少年读者的长征叙事不回避苦难乃至死亡时，“伟大”的历史内涵方能自行显现出来。

《起来》中冷小朵的形象之所以具备感染力，核心原因在于其人格特质中始终留存着无法被“觉醒”叙事体系完全吸纳的犹疑与算计；《凤凰图》中18名战士的形象之所以具备持久的艺术张力，核心原因在于其“与常人无异”，而非预设其具备坚不可摧的超人属性。“凡人”在叙事伦理框架中的定位，应是“伟大”得以被验证、被审视、被赋予具象化载体的重要尺度。

总而言之，这种新的创作取向亦存在须审慎对待之处。当“凡人”视角成为长征叙事中最受青睐的切入路径时，那些无法通过个体经验切近的结构性议题，包括战略决策的全局逻辑、军事组织的运行机制、不同部队间的协同与冲突，有可能在“小切口”叙事的伦理正当性遮蔽下被悄然悬置。魏巍式全景史诗的价值恰恰在于直面长征作为集体行动的系统性、复杂性，而此种复杂性无法被完全还原为若干个体的生存与觉醒历程。真正成熟的伟大与平凡的辩证关系，并非以后者替代前者，而是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持续的张力：既避免对普通人具象化存在的消解，也避免见树木不见森林，遮蔽宏观历史的演进逻辑。

90年的时间跨度，已使长征从历史事件演变为一片需要重新进入的历史场域。上述小说所践行的叙事伦理，本质上是在回应一个问题：后继的文学创作者如何与那段历史建立深层关联。当下作家给出的回应是，将叙事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、未留下姓名、在恐惧与血泪中作出抉择的个体。它代表着一种对“生成性”保持耐心、对“凡人”主体保持尊重、对苦难不进行粉饰亦不进行消费的叙事伦理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相关作品的成功经验也从侧面说明，长征叙事的文学生命力，恰恰存在于这种持续调整叙事姿态的自觉意识中。

（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）






文艺镌刻长征记忆

荒原上的开拓

——读张者长篇小说《天边》

张志强

《天边》要呈现的不是一个人的成长，而是一群人如何从荒芜中创造出世界。小说是从一声追问开始的。中原大地的红薯地里，10岁的少年八分仰起头问姥爷：“天边在哪里？”姥爷赵秉承答得十分狡黠：“天边在天山的边上。”八分于是悲愤起来，觉得大人拿车轱辘话糊弄小孩。

《天边》是一部拓荒书更是一部创业史。通常有关屯垦戍边题材的作品都会全力描写苦难，铺陈住地窝子、喝苦水、风沙蔽日、人拉犁等。张者不同，塔里木河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碰面才是他要写的重点。沙漠遇到河流，沙和水融合成土，这就形成了旷野和荒原，这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东西。

先有水与沙，再有土，再有旷野，再有草木，最后才是“这时，兵团人来了。”这个叙述次序不动声色地把兵团史嵌进一个拓荒的框架里。作者要说的是，兵团最本质的行为是“无中生有”，把地图上一片虚无的大蛮荒，变成一个可以住人、繁衍的世界，一个生机勃勃的人间。八分在沙丘上望出去，“天地沉默不语，万物寂寥无声”，他感到“那种广阔的‘无’，却比‘有’更能震撼人心。”

小说中的地名“一碗泉”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，它说的是，世界的第一滴水，不是江河湖海，而是被量过、被省着喝、被一个人的性命换来的“一碗”水。拓荒在这里不是从汪洋里分出陆地，而是兵团人说的“水要省在一碗里”。

在这片荒原上展开的第一件大事不是开荒，而是通信。中原和天边之间，信来信往。在兵团垦荒的姚桂嘉排长与赵秀英结了婚，秀英把孩子八分生下来搁在娘家，一个人走了。这孩子凭什么存在？凭的就是那封信里的婚约。他后来怎么想象爹妈？靠信封上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”那行红字，靠用军装改的童装，还靠衣服上留着的莫合烟味——“是新疆人的味道，也就是爹的味道”。一个从头到尾缺席的父亲，被八分靠文字和气味一点点描述出来。

这是一个由语言、信、气味、距离搭建起来的世界。当八分决定把“八分”改掉，取名“姚远”的时候，是人物的第二次命名、第二次出生。姚远，遥远，天边本就遥远。至此，人与地理合而为一，人被造出来的时候，就被造成了一个坐标。

《天边》的空间想象，具有独特的结构感，它像一张同心圆构成的宇宙图。最里圈是绿洲，出了绿洲是大田，出了大田是大漠，走出大漠才能走向全世界。张者说，少年时代他们把整个大漠当成舞台、当成天堂、当成青春纪念册。这句话里有层层递进的创造逻辑，家园是中心，劳动是它的延伸，荒原是它的边界，而世界在更外面等着。

《天边》最具史诗性的地方是，它的拓荒不是单次的，而是可以反复重演的，是被彻底世俗化了的。兵团已经繁衍到第四代，每一代人都在重新创造一遍自己的世界。姚远从各地招工，新疆、河南、重庆，四面八方的人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坐上绿皮火车，这些场景正是《天边》把一个宏大叙事拉回人间的方式。拓荒在这里是一次又一次的播种与采收。棉田里的吆喝、绿皮火车上的喧哗、不同地方的歌声和舞步……《天边》从拓荒的奇迹，变成了拓荒的日常。

小说的调性，最终要靠声音来确定。张者说，写这部小说最难的是调性，轻与重的平衡把握不好，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。为了找到那个调子，他专门跑去新疆听木卡姆。木卡姆是一门把苦难唱成欢喜的口头艺术，在悠扬的吆喝里唱述命运。找到了它，张者才觉得好写了。这让人忽然意识到，《天边》是一支曲子，张者用一份能唱苦难的谱子造世界。

《天边》创造了一个世界，最后是给沙漠“锁边”。“天边”就是边陲、戍边、锁边，乃至兵团人的边境守望，都围绕着一个“边”字。《天边》的落点在“边”，世界不是从中心向外的无限扩张，而是被人在最危险的边缘处一寸寸画定、缝牢、守住。

多年以后，姚远、黄建疆、李军垦三位老人在一家名叫“天边”的客栈里重逢，这家客栈此时已成游人纷至的诗与远方。黄建疆的女儿黄花问：“天边到底在哪里？”姚远答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这已经不只是造一个世界，而是造完之后，还要知道这就是世界。由此，张者完成了他的世界想象，这个世界是历史与现实、空间与时间的交织，也是物质与精神的激荡。

（作者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）



发掘蓝博洲创作价值

本报电（陈婉儿）近日，文学评论家石一宁新著《从被遮蔽的历史再出发——蓝博洲创作探论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。全书对中国台湾作家蓝博洲的创作进行了系统研究，指出其数十部报告文学以及长篇小说《藤缠树》等作品，通过还原历史真相，再现了台湾革命者和进步青年、普通民众的民族与文化认同。

专家表示，《从被遮蔽的历史再出发——蓝博洲创作探论》揭示了蓝博洲的创作如何从被遮蔽的历史出发，艺术地还原了中国台湾当代历史的诸多真相。尤其是对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，中共地下党人和进步青年的坚定信仰、理想追求及其从容赴死的史实发掘与客观公允的评价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

批评前沿

在场批评与专业眼光

——评行超文学评论集《想象一个女人》

孟繁华



行超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文学编辑，她因专业的水准和友善的为人，在业内有良好口碑。同时，她也是一位青年批评家，时有大小文章在专业报刊发表。行超一直在文学现场，对当下中国文学中的事件、思潮和最新作品，都有敏锐观察。这本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《想象一个女人》，是专门谈论女性文学的。一段时间以来，行超有意识地将自己研究和评论的对象集中在女作家。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知道，做当代文学评论，常见的问题就是四面出击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这种“居无定所”的批评不是不可以，但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，就是很难形成一个评论家的研究范畴或领地，也就很难形成一个评论家与众不同的特点和优长。行超能够较早地形成个人研究方向，是她能够完成“想象一个女人”的条件和基础。

这本书的导论“当溪流汇作大海”，几乎就是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简史，作者从语义学角度切入，然后描摹不同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实绩，概括一个时代的女性文学风貌，极为精准。然后是具体女性作家的创作评论。特别是对林白《一个人的战争》的评论，客观、有见地。行超把这部作品概括为“故事的开始”，看似平常却隐含了她锐利的发现。后面对王安忆、池莉等“昨日她们”的评论，同样与众不同。王安忆虽然并不有意强调自己的女性作家身份，但“从20世纪80年代的‘三恋’到90年代的《长恨歌》《天香》，王安忆创造了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，而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性别，更是时代、历史与人的宿命。”作者意在表明，女性人物的背后是时代与历史对她们的塑造和制约，她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物，性别只是其中一个因素。这种朴素的评价，显示了行超作为评论家的历史感。

文集最有价值的，是“今日之我们”和“无数种未来”诸篇章，她讨论的是这一代和更年轻女性作家的作品，这种“共时性”的观察和理解会更接近她们。“今日之我们”是综合性的评论，需要广阔视野和大量阅读，这是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特点。没有大量阅读，一切都是空穴来风。行超的大量阅读，显示了她的专业态度。她对付秀莹《他乡》的分析，关注主人公翟小梨的城乡经验。前现代的思想、观念和情感方式，正在被“现代”覆盖和抛弃，但前者在生活上仍然具有统治性。翟小梨意在象征任何个人走向“现代”的艰难和苦痛。如果说书中《想象一个女人》《消失的“她”》等篇是综合性的思潮论，那么《空间及其意义》就是一篇极具专业性的论文。“‘70后’‘80后’以及更年轻的作家逐渐登上文坛……空间叙事在她们笔下成为更加显著的存在，在这些作品中，空间变换着不同形式，构成了年轻作家观察世界、认识现实的重要路径。”这个发现，不仅阐明了新一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变化，同时也隐含了她们的阅历和经验。这不是价值判断，而是在描述中呈现了女性文学代际转换的事实。而书中另一篇《无数种未来》，杂花生树，通过梁鸿、尹学芸、何向阳、姚鄂梅、沈大成、苏更生、董夏青青等不同代际作家不同文体的作品，展开了更广阔的女性文学道路。特别是对杨知寒、三三等青年作家的观察，颇有见地：“这些作品大多不是狭义的女性主义，更体现了当下女性写作的多元性和开放性。”这样的判断首先来自在场的观察，得益于日积月累的专业修养。无论女性文学发生怎样的变化，这本书意在表明，女性文学业已汇入当代文学的大江大河，共同创造了今日文学之辉煌。一部主题性的评论集，既显示了行超在场批评的术业专攻，也显示了她的眼光和潜力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）

《脑机医生》：聚焦脑机接口与三代女性命运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年来，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医疗题材、科技题材成为网络小说创作的热门。近日，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、番茄小说主办的柠檬羽嫣《脑机医生》作品研讨会举办。《脑机医生》讲述神经外科医生苏见薇为留住患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的记忆，推进脑机接口研究，并联手科技工作者攻克关键技术的故事。小说交织姥姥赵春花、母亲赵冬梅与苏见薇三代女性的命运，展现她们彼此托举、突破困境的成长，也把个人亲情与科研理想上升到服务国家战略的层面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作品从“脑机接口”与“记忆退化”切入，在具备专业性和科技感的同时，并未陷入技术狂欢，而是将脑机接口作为背景，深度聚焦家庭伦理、女性命运与健康议题。《脑机医生》与其说是“行业文”，不如说是“科研行业文”，小说中的科研线索与烟火人间的故事并行不悖，可读性强。